

耕织纹样遐说

冯利*

因为插队当过农民，我有“耕”的情结；因为迷恋古丝绸，我有“织”的情结。曾与沈从文的大弟子王予先生（中国纺织考古学专家）过往从密，听其讲述古代织物种种；又结识沈从文先生的女弟子王亚蓉老师（亦是中国纺织考古学大师之一），听其课，听其聊古衣事宜；每与这些高人聊天，必有获。我所工作的台湾《汉声》杂志专注乡土文化，聚焦乡村人文，设有“土布系列”，出版数部相关著述，我的耕织情结被濡染得更加浓郁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曾买到一套清代《耕织图》石刻拓本，爱不释手，时不时把玩，兴趣浓厚，上北京图书馆泡了几天了解来龙去脉。其中一本新书引起我注意，即中国农业博物馆王潮生主编的《中国古代耕织图》（1995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）。该书是当时国内第一部全面、系统介绍中国历代耕织图像的专著，各种版本都有交代，有如《耕织图》博物馆，内容详实。美中不足是印刷不精，图像不清晰，欠缺学术的精细分析。遂萌生由汉声出版社再做一部《耕织图》的想法，深信汉声美术总监黄永松大师的设计功力、汉声对题材处理的手段，可以美化、深化和拔高《耕织图》的原有品质。于是联系王潮生先生，与王先生以及农业博物馆的其他专家反复磋商，并为此专门到大连图书馆库房看了该馆藏品《耕织图》。我的设想之一是要把每幅图像中的农具、织器提出来以白描图单独呈现，标明其名称与功能；还须把与历代《耕织图》相关的农事、纺织、方法与技术程序、与农历节气的关系……等等分析透彻。后因感觉老先生们不适应汉声的编辑模式和严苛操作，忍痛放弃，无果，憾事一桩。但是，王先生与其他几位权威农史大家的谦谦君子风范、学富五车的学者风范，令我高山仰止。尤其与他们的反复讨论，另外还就中国农具史深入细聊，犹如修了一门中国农史的博士生课，受用终生，这是意外之得。

因为这段插曲，对《耕织图》心有所牵，旋而发现耕织图案是中国纹样的一个大类，在建筑彩画、木板雕刻、石刻、织绣、墨锭、墨彩瓷板书、扇面、屏风都有大量呈现，尤以瓷器最甚，有太多瓷器上都绘有各种耕织纹样。

中国文明是农耕文明，自古以农为本，表现耕与织的图像，在战国青铜器、汉代画像砖和壁画中都有出现，几乎全是以零星单一图像呈现不同场景，不成系统。到了南宋，南方有一县令楼璩，把民间四时耕织场景用图画和诗文形式记录在纸上，每图赋诗一首，以向后人传授耕作秩序，即使不能识文断句者也能从图画中看懂。楼璩版《耕织图》分耕21图、织24图，诗画并举。他将《耕织图》献给宋高宗，深得高宗赏识，遂命宫廷画师照样临摹，诞生了体系完整的南宋宫

* 冯利，美籍华人，彝族，自由撰稿人。

廷版《耕织图》。元、明、清各朝宫廷皆延续绘制《耕织图》的传统，历代版本都是以楼图为祖本临摹或改绘。

绘制《耕织图》成了南宋以后中国宫廷绘画的一个特殊传统。最痴迷《耕织图》的是清朝皇帝。游牧民族如何统治农耕民族，如何做好以农立国，清王朝是下了一番大工夫的，几位皇帝前仆后继磨合和努力，极重视农桑耕作，每年开春，皇帝亲领文武百官行藉田礼于先农坛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以固政权。别的不细说，高度重视《耕织图》亦是其中一举。康熙帝亲自为《耕织图》题诗，名《康熙御制耕织图》；雍正帝干脆让画师把自己的形象直接画入《雍正耕织图》中；乾隆帝更绝，按照江南农家风格在清漪园（今颐和园）劈出一片男耕女织实景体验区，有稻田、蚕房、织房、染坊，时不时御驾亲访下田，体验耕织农事（皇帝是主题公园先驱啊）。这片耕织图景区后被英法联军烧毁，只留下一块乾隆帝御笔《耕织图》石碑。

清朝皇帝对《耕织图》的热情影响到社会。《康熙御制耕织图》被坊肆私家广泛摹刻，传世版本极盛，刻本、铜版、石印本先后迭出，传至全国。《康熙御制耕织图》是历代《耕织图》中最具盛名、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的一部，也是中国古代版画史上的传世经典。《康熙御制耕织图》在南宋楼图基础上做了改动，在耕与织两部分都有增减替换，共46幅，每图除保留楼图的五言诗外，在图的上部另赋康熙帝写的七言诗，康熙还亲自为其作序。它的最大特点是在继承前人耕织图传统画风基础上，加入了西洋绘画技法，中西合璧，别开生面，很是洋盘时髦，让民众开眼，坊间竞相印制。今有学者专门研究《康熙御制耕织图》的独特构图法、中西融合绘画技巧等。

上有所好，下必效之。从康熙年间开始，瓷器上开始出现耕织纹饰，康熙之后，逐渐成为清代瓷器的传统纹样，青花、五彩、粉彩皆有，往往一耕一织，图案空白处配以《耕织图》中的诗文作装饰。耕织纹饰逐渐又演变出各种“农家乐”纹样。有人说：瓷器耕织纹样中的农夫形象是皇帝本尊。此话不完全准确。官窑瓷器的制作有皇家机构严格把关，官窑瓷器春耕图里的人物很可能是康熙皇帝，以显皇帝对农耕的推崇和领导（据专家和行家说，清代瓷器的耕织图案基本都是以《康熙御制耕织图》为蓝本）。但遍及全国的民窑耕织纹样里一定不是皇帝本尊。一则，民间匠人不是专业画师，画技良莠不齐，万一一些蹩脚画师把皇帝像画糟了呢？想来朝廷不会允许民间匠人随便做此事；二则，如果瓷器纹样中的人物是皇帝，民间匠人作画时必须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，否则就会成为犯上的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，成品速度大打折扣。所以，存世最多的民窑瓷器耕织纹样中所绘人物，当是普通农夫织女。

瓷器耕织纹样里的农夫虽然不都是皇帝，但这种纹样在清代的流行，却是几代清帝以重修《耕织图》表达重视农桑、尊重汉族农耕文明的结果。勤勉政事又极具审美品味的雍正甚至把自己入画，画出皇帝亲自下田干农活的《雍正耕织图》。《雍正耕织图》里的人物还画了雍正一家子，皇室男女成员身着汉服，在田里辛勤耕作。其意既表达了重视农桑的国策，也有体现满汉合一、文化相融的政治目的。皇帝下田亲耕，是政治正确的导向，耕织纹样也就在瓷器制作行业蔚然成风，批量产出，也成为宣传农业生产技术的“劝农”新形式之一，提醒国人莫忘农本。

所以，若看见有耕织纹样的瓷器，不用费心猜，十有八九是清代康熙之后的玩意儿。

翻看《耕织图》，浏览清代瓷器的耕织纹样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：“实现小康”、“解决温饱”、“和谐社会”、“民族融合”之类，并不是现代人的新创观念，清朝历代皇帝在《耕织图》里表达和宣扬的就是这些思想。遍及全国的耕织纹样瓷器，向老百姓彰显了大清朝农业社会其乐融融的小康、和谐景象。清帝们通过对《耕织图》的重视，还传递了讴歌主体民族农民、赞美辛勤劳作的正能量，引导世风。清朝结束后，农民从此不再是瓷器纹样的主角。走笔至此，顺提一句，康乾盛世的经济实力和经济体量世界领先，不输西方列强，正是皇帝治国有方的结果。清朝后来的失败不是败于内乱，不是败于经济衰退，而是败于皇朝权贵对世界的无知和傲慢，败于始终视自己是朝贡体系的中心，败于对双边贸易平衡的无知，败于生产关系的陈旧（其生产力并不差）。一句话，当19世纪贸易全面国际化时，清王朝的经济实力虽比前人大大进步，但外部世界比你进步得更快，你却以夜郎心态的战狼外交应对世界，必亡。

中国这个泱泱瓷器大国，瓷器历史源远流长，瓷器纹样特具时代性。不同的时代，因社会某些世相的变迁，出现新的纹样。纹样是瓷器的重要符号，有时根据瓷器上的纹样就能判断出它的大致年代。比如宋瓷纹饰常见婴戏图、人物生活图，是受宋代绘画的影响。元青花有不少鱼藻纹，常见绘青鱼、白鱼、鲢鱼和鳊（鲫）鱼在水藻中游弋的瓷器图案，叫“青白鲢鲫”纹，是元青花瓷器上最具政治色彩的鱼类纹饰图案，寓言清白廉洁（四川话鲫与洁音相近），表达元人追求政治清明和吏治廉洁的意愿。耕织纹样则是清代康熙年后特有的。笔者曾在旧货市场买到两只碗，上印繁体中文“为群众种田”，一看就是上世纪50年代《简体字规划方案》推出来之前的货。文革时期，瓷器厂把毛泽东语录“为人民服务”、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”等印在瓷碗上，留下标志明确的文化文物。

中国纹样，凡图必有寓意，且特定纹样的出现常与国家的政治导向有关。1949年以后，瓷器纹样中再也没有才子佳人、戏曲人物这类传统人物图案了。举目当今中国瓷器，走遍市场，很难发现有时代特征纹样的瓷质餐具，给后人鉴别今日瓷器造成一些困难。建议瓷器厂生产一些瓷碗盘，印上国家领导人的“今日金句”，让人们用餐时也能学习金句，吃饭、革命两不误，利于领袖话语牢记心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留存家中，有利于后人考古，你的十八代孙某日在角落里偶然发现，经过对瓷器上金句纹样考证，可溯源其先辈（我们）时代之种种，这是为瓷器留下时代纹样的美事一桩。此举不仅顺应当朝人的政治学习，也惠及子孙后代收藏考古，“风物长宜放远量”，这种有大格局的事情，瓷器厂老板何不为哉？